

风险社会与中国人口结构安全

李建新*

摘要：本文以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与传统的风险概念不同，现代风险社会中风险多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人为风险。在解决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上，我们越是强调人口数量问题重要，我们越是“制造”出更多的人口结构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人口结构风险问题，这些由于只顾控制人口数量而引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已经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的负效应，更是为未来的社会埋下了隐患、留下了风险。我们需要站在人口安全和人口战略的高度认识我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现“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风险社会 人口结构 人口安全

一 引 言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着诸多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风险和危机，如核危机、全球变暖、基因食品等。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风险和危机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高度发展，而传统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与调控模式已难于应对。随着20世纪80年代（与《风险社会》出版几乎同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人为事故发生爆炸、90年代初英国疯牛病爆发与蔓延，以及21世纪初亚洲特别是中国的SARS肆虐，更是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就置身于“风险社

* 李建新博士，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会”之中。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已日益深入世界每个角落、“风险社会”日益显现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口学者及政府开始关注“人口安全”问题。显然，“人口安全”概念的提出，与我们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之后。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或全局性危机（张维庆，2003）。从这个定义出发，中国人口无论是数量、结构，还是素质都存在着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本文结合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分析视角着重分析中国人口的结构风险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会有益于我们对“风险社会”中人口安全和决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把握。

二 风险社会与风险规避

20世纪90年代，贝克的《风险社会》英文版伴随着英国疯牛病“风行”起来，风险社会也成为英语世界关注的焦点。众多的学者纷纷从文化、现代性、生态危机、协商民主等不同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以及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所分析的视角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结论则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将面临着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概念，贝克所界定的“风险”概念是指：“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贝克，2001：119）贝克在总结其表述有关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社会学概念时，做了8点归纳，其主要要点是：风险并不是指已发生的损害但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人们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其次，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和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再次，风险概念与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这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指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二是指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行动（贝克，2002）。

西方世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了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有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是像旱灾、地震、饥荒和暴风雨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

无关的风险；第二类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即人为风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吉登斯，2001，2003）。外部风险有着确定的原因和可预测的结果，而人为风险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果上都不确定。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如环境风险和健康威胁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它们是我们主观能动干预自然的结果。诚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再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的担心是我们对自然所做而引起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让位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如何规避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人为风险？20世纪80年代德国在生态问题争论中，提出了“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指，即使存在不可靠的科学依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也可推及其他类型的风险）采取措施。例如，如果全球变暖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们又对此做了一些预防，那么我们就赢了。如果威胁是虚假的，我们损失的不过是投资和“保险费”。另一方面，如果威胁是真的而我们又什么也没做，直到为时已晚，那么我们会陷入一场大灾难之中。这种思考方式最早体现在概率论创始人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关于犯两种不同类型错误其代价也不同的原理中。帕斯卡尔认为，人们可能会犯两类不同的错误，第一类错误是错误地拒绝了一个真实的假说，第二类错误是接受了一个虚假的假说，两种不同类型的错误导致的风险和成本也不同。所以，面对不确定的生态风险，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认为，我们最为谨慎和合理的选择是：我们应该这样思考和行动，就好像人们的行为后果真的会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推向生态和环境可持续的极限，而且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能力的减退。因此，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向可持续性转变（哈珀，1998）。显然，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即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其中一些可以说是大灾难，如全球性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等。我们既要对我们人类过度的干预行为进行反思，也要直面我们身陷其境的风险社会。

三 不同的人口结构风险

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自马尔萨斯以来，一直被学者们广泛争论和关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口爆炸”更引起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深切忧虑。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世界上都在关注的问题并没有被贝克、吉登斯等学者列入风险社会中讨

论。其实，这一方面是对于具体某个国家或地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会把本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增长问题上升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危险程度，因而不存在国家政府进行人为强行干预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地区没有强行的生育干预与其尊重个体生育权利的价值观有关。中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人口历史和现实，除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手论”的自信乐观外，庞大的人口数量规模似乎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政府开始实施全国性的计划生育以来，特别是80年代初的“一孩政策”的出台，更是显示出政府要迫切甩掉人口这个沉重“包袱”的决心。所以，中国也就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人口生育过程强行干预的国家，而这种理性的干预目标则是要尽快实现“富国强民”。

不可否认，我国确实存在着所谓的人口安全问题，无论是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都会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目前两种不同类型、又密切相关的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常常引起不同的争论，一类是人口数量规模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另一类是因为要解决第一类人口数量问题而引发人口结构（广义的结构概念）的安全问题。对于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认识，一般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人均GDP的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的保护都有负面影响。就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来看，人口数量带来的风险基本上被认为是可预测的、是可确定的。但是，人口结构风险，从风险理论的视角看，这种人为干预“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不确定的、是潜在的，可能具有更大危害性。这种因为过度预防人口数量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类同于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也更需要我们及时预防。下面我们就着重讨论这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结构风险问题。

1.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在诸多的人口问题中，人口与（经济）发展通常是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自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论》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息。除马尔萨斯经典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论述外，20世纪60、70年代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等以及紧跟其后的西蒙、康恩的“资源富饶论”等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1997年，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东亚人口和经济发展为例，从人口变迁的历史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Bloom & Williamson, 1997; Williamson, 2001）。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指出，在人口

转变初期，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因此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使人口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下降、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人口数量增长减缓，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Demography gift）阶段；当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人口趋于稳定、趋于静止，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都趋于常量，趋于不再变化，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通过这一完整的论述，我们明白，其实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主要是由于人们还未从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而仅仅是在不同变化阶段上进行论证。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发展了人力资本的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口教育的投入和健康的投入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效用。因此，人口素质、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为至关重要的。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与其说是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关，不如说，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才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变化才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而不是人口规模的大小。

西方历史人口变迁和当今人口转变都证明了上述观点。同样中国也是如此。从纵向历史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后，我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开始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相呼应。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如今，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都乐观地预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可以保持10年、20年，能够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只考虑人口因素的话，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处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时期，正处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于学军，2003；蔡昉，2004）。从横向地域上看，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单从人口的角度看，这些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处在优势之位。例如北京、上海人口抚养比最低而人均GDP最高；贵州、西藏人口抚养比最高而人均GDP最低。同样，这些发达地区也是人才济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素质最高的地方。所以，与其说是数量对

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不如说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

事实上，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的素质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大小。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人均指标的时候，我们会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我们“一孩”政策的背后恰恰就是这种逻辑。继续实施只顾及人口数量的严格生育政策，虽然会少生不少人口，但却会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不仅使“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迅速丧失，使中国经济失去可持续增长的活力，也会使中国丧失国际竞争力。实际上，那些被“津津乐道”的少生人口恰恰是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不顾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越是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可持续性产生威胁，越是影响综合国力的提高、影响国家安全。

2. 出生性别比结构风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而且有不不断加重的趋势。1982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普查为114.1，到2000年第五次普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更是严重偏高到近120。2000年的普查分析证明，性别选择（B超）的人工流产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于弘文，2003）。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相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近年来，出现了人口学上的反常现象，即女性婴儿和低龄组女孩（0~4岁）死亡率偏高，高于男婴和低龄组男孩。学者们对这种现象的根源解释是，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重男轻女、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朱楚珠、李树茁，2003），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导致了女孩生存环境的恶劣，不仅在饮食营养，而且在预防保健上都比男孩要差。的确，不可否认，B超技术的广泛普及滥用直接与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有关，女婴的健康受到轻视也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有关。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继续追问，为何越来越多的女性置自己身体健康于不顾而追求生育男孩？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直存在，为什么女婴生存环境没有与国家整体的生存条件改善同步，反而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现持续恶化的现象？从人口学自身出发，我们又不得不将之与现行生育政策联系起来。一方面，严厉的减少人口数量的一孩生育政策并没有给人们性别选择留下空间；另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结构（农村“一孩半”政策）又在重男轻女的土壤上诱发出了出生性别比特别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偏高。关于人口学和计划生育政策这方面的深入解释和反思，我们常常是轻描淡写

或干脆就避而不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经济学理论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强制性生育政策并以中国为例有过一番详尽的比较和深刻的评论。他指出，首先这种强制过程已经付出了某些代价，包括侵犯了某些自身具有的重要权利。其次，强制性生育政策导致了另外一些社会后果，例如，对于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国家如中国，一孩政策对女孩会十分有害，导致女婴死亡率升高。中国的这些经验表明，“失败并非由于因果性控制上的困难，而是由于固守一种片面的眼界所造成。合理的理性思维必须考虑更多因素。”（森，2002：220，275）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森认为：人口问题常常被夸大，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我们已经看到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已经发生的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有关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给未来留下更多与之相关的风险和后果如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社会不安定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其他社会问题，这些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过度“干预”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结果。

3. “四二一”家庭结构与独生子女问题

从微观看，这是一个家庭结构倒金字塔问题：向上是家庭养老问题；向下是独生子女下一代问题。关于独生子女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独生子女群体与非独生子女有何不同？这种不同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是本文力所不及的。不过从微观和宏观风险的视角上讨论不同政策结构带来不同的家庭结构是有意义。如果继续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孩家庭，越来越多的三口之家。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三口之家的关系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家庭成员之间只形成三种关系（夫妻、父子、母子），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对子女来说，他们只有上下的代际关系而没有同代同辈的关系。两孩家庭即四口之家的关系结构就不同了，家庭成员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形成六种关系〔夫妻、父子（两个）、母子（两）、子女之间〕，对子女来说，不仅有上下代际关系还有同代同辈关系。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不同就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而家庭环境是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化机构。虽然，个体的成长还会受到次级社会化机构如学校、同辈群体、社会的影响，但家庭毕竟是下一代出生之后婴幼儿期、儿童期成长的重要一环，因此，即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

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结构不同而可能产生不同。如在一孩家庭中，不可能产生同辈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二孩家庭中，首先会产生血缘的同辈关系，如兄弟情、兄妹情、姐弟情和姐妹情。而这种关系又是进一步培养出个体的某些优良品质的基础，如兄妹之间，兄长可以培养出一种照顾小妹的责任感，而小妹可以培养出一种对长兄的尊重。而一孩家庭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无怪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争论不休，独生子女的个性品质、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都成为关注的焦点（风笑天，2003）。对于大多数一孩家庭来说，父母都特别疼爱孩子再加上四位老人（如果都健在）更是关爱备至溺爱有加，对子女有着较高的期望值，一切都以“下一代为重”。新近的有关资料显示（央视新闻，2004），我们新一代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自1985年以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6~18岁的学生中，肥胖生高达15%，一些学校的肥胖生比例甚至突破了30%。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现的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的病症，近年来在青少年身上也时有发生，且患病年龄提前了10~20年。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出台了以“健康第一”为宗旨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干预措施。早在1986年，《光明日报》就对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进行了讨论，其结论是：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风笑天，2003）。在此，笔者并无意也无力要得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独生子女身心健康问题的结论。诚如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原因引发的不确定的后果一样，统统“归罪”于独生子女政策有失公允。但从规避风险的视角出发，我们必须要有防范的意识，必须要“未雨绸缪”，不能总是事后疲于弥补和干预。在自然生态学领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铁律：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导致稳定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为减轻人口数量压力而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孩家庭。即便是“独生子女”问题的争论是不确定的，我们也必须预防这种单一性和脆弱性，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不仅仅关系到每个家庭，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而且，多元的二孩家庭结构要比单元的一孩家庭结构更能够抗拒各种外部风险（如天灾、意外伤亡、战争等）。所以，无论是从规避风险抗拒风险，还是从微观家庭、从宏观民族国家的角度，我们都不能继续选择充满风险的一孩政策，都不能再继续人为地制造风险了。

4. 其他可能的结构问题

以上我们讨论了如果继续单纯追求一个人口数量减少的目标，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及动态的变化过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家庭、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不利影响和可能风险。而这种人口变动过程越迅速，问题和风险就越大。其实，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远不止表现在经济、社会层面方面。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还与文明兴衰以及民族冲突有关，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过深刻的论述（李建新，2004）。当今世界也是人口两极的世界。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世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口趋于老化并于20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增长空前膨胀，并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世界人口变迁有史以来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和民族冲突中的意义显露出来。因此，亨廷顿从人口变迁的视角关注其对文明兴衰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人类历史上长期与西方文明对抗的伊斯兰世界的人口迅速增长在文明冲突中的作用。从人口史上看，西方工业革命和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其年轻型人口勃勃生机的力量。所以，人口决不单单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其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兴衰。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放在世界人口变迁、文明兴衰的大背景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单纯减少人口数量压力的目标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也不利于中国文明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内民族差别的结构性生育政策也不利于民族平等、文化融合。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民族差别的生育政策会给未来留下风险，人为留下不确定的隐患。

四 人口安全与人口决策

在我们看到加速工业化、片面追求无质量的经济增长带来日趋严重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時候，我们常常钦佩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深刻洞见：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宽泛地讲，我们人类难道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吗？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有着自觉的明确的人为干预因素（如对死亡、生育的干预）；与所有存在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地区相比，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为严格的人口生育控制和人为干

预。而事实上，这种过度干预人类自身再生产不仅在干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更人为制造出了许多相关的潜在的不可确定的风险，这是典型的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我们同样可以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人口数量控制的“胜利”。这样的“胜利”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是到了我们需要对这些历史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今天越是只关注人口数量安全、越是强调减少人口规模，就越可能人为制造出更多的人口结构问题，给未来制造出更多的风险、埋下更多的隐患。人口数量减少和人口结构迅速变迁是一个人口动态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对控制人口数量投入越多，对结构和素质问题就会越忽视。一个过快负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负效益和危机远远大于人口趋于稳定所带来的。所以，无论是追求一个小远于现今人口规模的所谓适度人口目标，还是单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都是一个冒很大风险的、很不安全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人口数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所洞见的人口问题完全不同，马老当年看到的是人口过快增长、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而我们今天是一个低速的惯性人口增长（即低于更替水平）和业已存在的庞大人口。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毛泽东所强调的“人手论”未必不正确（林毅夫，2004）。那个时代，由于国际上东西方冷战，中国的外部世界遭到了封锁，中国不得不选择自力更生的备战型的重工业化道路，加之国内政治斗争不断，计划经济受挫，这些不利因素都无法促进人口经济发展良性循环致使我国人口问题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计划生育促使人口转变，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政通人和、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这些有利因素叠加使得我国众多“人手”有了用武之地，世界上独一无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成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一种优势。今天，我们看到，两倍于20世纪50年代人口的13亿人口与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时期并存，除其他外部非人口因素，正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红利”期。不过，一些学者与政府官员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资源并不乐观，总是充满着悲情论调，充满着要迅速甩掉人口数量这个大“包袱”的使命感。其实，我们所强调的追求人口过快的负增长导致人口结构迅速变迁从而对人类自身、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恰如马寅初先生当年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一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很显然，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的人口数量资源优势，对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不是损害而是加强和提高。相反，由过度控制人口数量而引发的人口结构安全问题还

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忽视上述人口结构问题，势必会危及到人口自身再生产、危及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

在2003年中国经历SARS危机之后的秋天，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总结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思路、新观点，并具体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观点、新要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些理论上的新突破、新观点同样会对指导我们认识和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宽松、协调的和谐社会，是我们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反思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以及我们对当前人口问题的认识，我们是如此片面地强调人口数量压力问题，如此重视减少人口数量规模，如此牺牲人口结构而一味追求数量指标，这是否合乎我们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是否合乎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我们需要跳出“以数为本”，回到“以人为本”的原点。对于不确定的人口结构风险，我们需要一些预防意识，不能总是事后诸葛亮。况且，对人口过程事后弥补往往是无济于事。我们需要跳出为解决人口数量而制造出更多人口结构问题的怪圈。笔者以为，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并举、统一，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合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才更有利于我们追求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人口数量稳步变化（即兼顾结构变化逐步下降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长远的、统筹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决策，而不是一个人口数量迅速减少、牺牲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短期政策，这是风险社会中的人口安全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 贝克，乌尔里希，2002，《风险社会再思考》，郗卫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第4期。
- 贝克，乌尔里希、维尔姆斯，约翰内斯，2001，《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蔡昉，200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北京：《人口研究》第2期。

- 风笑天, 2003,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 回顾与前瞻》, 上海: 《社会学》(月刊) 第 1 期。
- 哈珀, 查尔斯, 1998, 《环境与社会》, 肖晨阳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吉登斯, 安东尼, 2001, 《失控的世界》, 周红云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吉登斯, 安东尼, 2003, 《社会学》(第 4 版), 赵旭东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建新, 2004, 《文明冲突中的中国文明与人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人口要素》, 北京: 《人口研究》第 1 期。
- 林毅夫, 2004, 《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聚焦中国人口安全》, 金小桃、郑晓英主编,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 森, 阿马蒂亚, 2002, 《以自由看待发展》, 于真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央视新闻, 2004, 《我国将对 2.3 亿青少年健康状况进行干预》, www.cctv.com/健康版。
- 于弘文, 2003,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 是统计失真还是事实偏高》, 北京: 《人口研究》第 5 期;
- 于学军, 2003,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北京: 《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 张维庆, 2003, 《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 北京: 《市场人口与分析》第 5 期。
- 朱楚珠、李树苗, 2003, 《关爱女孩, 保护女孩》, 北京: 《人口研究》第 5 期。
- David E. Bloom &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68, November.
- Jeffrey G. Williamson, 2001, *Demographic Change,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Population Matters*, Edited by Nancy Birdsa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sk Society and the Structural Safety of China's Population *Li Jianxin/177*

Abstract: Being inspired by the insights of Ulrich Beck's "risk society"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isks and structural safety of China's population. In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term, the risks in modern society are largely "manufactured", man-made risks. The effor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engendered by the siz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By focusing on the risk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more we focus o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relating to population size, the more problems we tend to "produce" in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austere measures designed solely for suppressing the size of population not only brings about many negative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to the present society but also sows the seeds of risks for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author strongly recommends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with a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China's population safety and population strategy and to refor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policy accordingly.

Key words: risk society, 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security

Book Review and Research Note

The Reality and Trends of the "Neo - Traditionalism"

——A Reading of the Communist Neo - Traditionalism

by Andrew G. Walder *Wang Hejian/189*

Village Morality and Power amidst the Context of Movements

——The Leadership and Its Moral Predicaments of

the Chen Village during the Mao Era *Zheng Xin/197*

A Memoir for the Unforgettable "Home of Academics"

besides the Port Toulouse *Gao Hua/209*

Call for Papers 219